



故乡·故人

去年腊月二十八日,我们兄妹相约回故乡一起过春节。这是自父亲去世20年后,我们第一次回家乡清水河县,与亲朋好友相聚。看到熟悉的老人,陌生的小孩儿,真有一种“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无改鬓毛衰”的感触。

在熟人当中,我见到了曾与我同桌的赵翠莲同学和她的女儿郭雨。郭雨小时候我曾见过一次,当年她特别天真可爱,我曾在母亲家里为她们母女留下了这张照片(右为郭雨)。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,郭雨大学毕业后在包头当上了一名计算机教师。时光荏苒,当年给她们拍照的我和现在的郭雨年龄相仿,如今的我却已人到中年。

文/高晓梅

亲如兄弟

这张照片摄于1957年正月。

1955年腊月,我(前排右)和同乡靳招栓同志(前排左)参军,并一同被分配到内卫三团手枪连。因我俩人伍前在家乡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,所以非常荣幸地被分配到内蒙古党委执行警卫任务。

每逢佳节倍思亲,当时在家乡务农的大哥(后排)牵挂着我这个已离家两年的弟弟,便辗转来到部队探望我,朴素的兄弟之情至今难忘,而我和靳招栓同志的同乡友谊,经过部队的教育和锻炼,也变成了如同兄弟般的战友情。

靳招栓同志1959年退伍到包头202军工厂,现已退休在家安度晚年。而我的大哥已经故去多年。每次看到这张照片,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。六十年弹指一挥间,如今我已年过八十,人生易老,却始终难忘战友情、兄弟情。

文/刘文斌



温情瞬间

1988年儿子1周岁时,我们家有了第一部照相机,这是在他一周岁时,我和妻子省吃俭用,请大哥在北京帮忙买的一部“长城”牌120.135通用型照相机。在那个年代,这样的照相机要一百多元,这个价钱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不是小数目,因而照相机也属于奢侈品,即便有照相机的人也不轻易借给别人使用,怕弄坏了,人们也知道照相机的娇贵,没人张口向人借。在后来的日子里,我们不知换了多少部照相机,但这部“长城”牌相机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被丢掉,而是一直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家里,因为它是一种纪念,是它为他们母子留下了温情的瞬间。

一晃近三十年过去了,曾经的孩童已成为人父,每当我看到这张已经微微泛黄的照片,幸福感便油然而生。

文/许双福



全家福

1958年7月,我们全家在将军衙署斜对面的新新照相馆拍摄了这张照片,照片中间是双目失明的奶奶,母亲抱着两岁的妹妹,父亲那年36岁,在乌素图水库工地上结束了一个月的劳动刚刚回来,他身后是我,我旁边是弟弟。拍完这张照片后,父亲和正在上初中的我立马参加了修筑呼哈铁路的义务劳动。

50多年过去了,历经时代的变迁,度过艰难的岁月,奶奶在困难时期病故,父亲母亲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幸福生活,先后以高龄离世,我们兄妹3人的家庭美满幸福。看着这张照片,我不禁感慨万千,回忆往昔峥嵘岁月,心中满是对亲人的思念。

文/张锡范



团聚

这是1962年春节在包头白云鄂博铁矿拍摄的一张全家福,照片中是矿工董师傅和他的七个孩子。照片右一董师傅的长子,但却不姓董,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:董师傅原来在吉林省的石咀铜矿工作,1954年支援白云鄂博铁矿建设,从东北来到包头。当时,董师傅有一对孪生儿子,他就把大儿子留给石咀铜矿一位姓金的工友家里。1962年大儿子来到包头寻亲,找到了董师傅一家,铁矿住宅区的平房传出了欢声笑语。为了纪念这次团聚,一家人特意拍了一张团聚的全家福,照片中的右一和右三就是那对孪生兄弟。

文/金玉民



桃李情深

我的梦想是教育事业,从小就盼着当一名人类灵魂工程师,后来梦想成真了。

1960年,我从呼和浩特市第一师范学校毕业至1994年退休,一直从事小学教育工作,一刻也没有离开这个岗位。教育工作伟大而神圣。几十年了,说我桃李满天下也并不夸张。我付出的是爱,得到的是快乐。在工作期间,若有困难,学生们争先恐后来帮忙。每年教师节,我都会收到一大摞贺卡,我把它珍藏在一个精制的小木盒中,不时拿出来翻翻,看着那些手写的、我十分熟悉的字迹,欣喜之情油然而生。

1974年,我得了一场大病,学生们陆续前来探望。病愈之后,学生们相约来祝贺,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拍的,前排右三是我本人,照片中前排右四是我的女儿杨萍,其余都是我的学生。

文/白素珍

